

论宋代的蕃学教育

孙廷林

(暨南大学 历史系,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蕃学”所指有三。蕃学教育特指在边疆地区、外来族群集中地区为这些族群专设的官办学校教育。宋代蕃学教育分布于青、甘等西北,泉州、广州等东南,荆湖、黔南等西南地区。宋廷制定具体措施,保障蕃学教育师资。教学内容注重照顾到边疆民族地区实际情况,在教育原则上强调循序渐进,避免急功近利。宋代蕃学教育主要实施于神宗、徽宗等积极开边拓土时期,是军事手段开疆拓土之外,通过文教加强教化,促进族群认同的重要措施。

关键词:宋代;蕃学教育;边疆地区;地理分布;教化

中图分类号:K244;K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5)05-0084-04

宋代蕃学教育是推动“一道德,同风俗”,加强族群文化认同的重要手段。有关研究成果对宋代蕃学教育的认识尚不够全面。如有学者认为“北宋王朝在吐蕃、党项两个少数民族聚居的缘边州、军,提倡官办蕃学”^[1],把宋代蕃学教育仅限于甘肃、青海等西北地区。或仅着眼东南泉州、广州的蕃学,认为蕃学仅是“宋代为长住广州、泉州的外国侨民子弟所设的学校”^{[2]115}。本文在厘清“蕃学”一词含义基础上,考察宋代蕃学教育的地理分布、师资保障措施、教学内容与教育原则,以及蕃学教育在宋朝开疆拓土中的作用。不足之处,尚祈方家正之。

一、“蕃学”正名

“蕃学”所指有三:其一指中原王朝周边部族、其他国家子弟游学京师,就读于太学、国子监,称外蕃学生。宋人将此意义上的“蕃学”追溯至东汉明帝。《群书考索》“蕃学”条即记载:“汉明帝别立校舍,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弟入学。”此后,“唐太宗天下初定,增筑学舍。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3]411}。汉唐时出现四夷等周边民族政权遣子弟入华求学现象,唐贞观年间“外蕃学生达到相当多的人数”^{[4]255}。当时虽已出现以汉文化教化四夷的教育实践,但尚无“蕃学”之名,亦无专门为四夷子弟所设的学校。北宋初,周边民族政权子弟入华求学于京师国子监,仍无专门“蕃学”。太平兴国元年(976),“高丽国人金行成始入学于国子监”^{[3]411}。元丰七年(1084)正月丙戌,“诏高丽王子僧统从其徒三十人来游学,非入贡也,其令礼部别定宾劳之仪”^{[5]卷343}。均为周边民族政权子弟入华求学。北宋末,太学中设立专门接收蕃学生的俊选斋、造士斋^{[3]411}。这可称是宋代中央级的专门招收海外留学生的学校,所教授内容为儒家经典。

其二,与中央级的接收海外留学生的学校不同,“蕃学”又特指地方州郡尤其是边疆地区、外来族群集中地区为周边族群专设的学校教育。郭声波教授认为:“宋人习称异族为‘蕃族’,则‘蕃学’者,盖为异族特置之留学校,类似今之民族学校。”^{[6]191}此意义上之“蕃学”的出现时间,近人孟宪承认为:“外人入国学者,

收稿日期:2015-05-30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人才2012年支持项目“教化、认同与边疆秩序”(NCET12-068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专项暨南跨越计划“教化、认同与边疆秩序”(12JNKY009)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孙廷林(1986-),男,河南方城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历史文化地理、近世民间信仰。

唐代以后,记载甚多。至外人入地方州郡学,则自宋始。”^{[7]178}北宋中期,“神宗熙宁五年,诏陕西置蕃学”。此为专门的蕃学最早出现的标志。因此可以论定此意义上的蕃学教育起源于宋代。蕃学学生来源主要有两类,其一是大量留居中国的蕃客或世居中国的土生蕃客的子弟;其二是受本国派遣的外国留学生。蕃学的课程设置和教授内容以中国儒家经典为主,同时注重照顾到蕃学教育对象的族群文化特点(详见下文)。专门蕃学教育学校的设立,有利于加速蕃客子弟中国化的过程,使他们尽快地适应中国的整体文化氛围。

其三,“蕃学”还专指西夏党项族语言文字之学。西夏元昊称帝,其官属置蕃学、汉学,以“野利仁荣主蕃学”^{[8]13994}。此“蕃学”与“汉学”相对而言,“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8]13995},故此“蕃学”指西夏党项族语言、文字之学。西夏以“蕃学”科举取士。“元昊思以胡礼蕃书抗衡中国,特建蕃学”,其学生从“蕃汉官僚子弟内选俊秀者入学教之,俟习学成效,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所书端正,量授官职”^{[9]152}。

二、宋代蕃学教育的地理分布

宋代蕃学教育,专指上述第二个层面而言,即宋代在边疆地区、外来族群集中地区专门为这些族群所设的官办学校教育。从地理分布上来看,宋代蕃学教育分布于西北、西南等新辟郡县之地以及东南沿海阿拉伯人聚居的广州、泉州。

西北地区,以熙州(治今甘肃临洮县)、河州(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等地的蕃学教育最为突出。熙宁六年(1073)十二月壬午,“熙河路经略司言:熙州西罗城已置蕃学,晓谕蕃官子弟入学”^{[5]卷248}。熙州蕃学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专门的民族学校”^{[6]192}。其实此前的熙宁五年(1072年),“种世衡在环州(今甘肃环县)建学,令蕃官子弟入学”^{[5]卷233}。这说明已经出现了专门的民族学校。稍后,熙宁八年(1075)三月戊戌,“知河州鲜于师中乞置蕃学,教蕃酋子弟”^{[5]卷261}。徽宗时期,与宋王朝进一步在西北开疆拓土相配合,又于崇宁四年(1105)八月,“置蕃学,于熙河兰湟路”^{[10]451}。宋代西北地区的蕃学在地理上的分布,相当于今天的甘肃、青海、陕西交界的洮河流域、甘肃的临夏地区、兰州地区和青海东部地区。据统计,宋代西北地区蕃学有西宁州(今西宁市)蕃学^{[11]340}、环州蕃学、熙州西罗城蕃学、河州蕃学、熙河兰湟路蕃学等。

宋代东南地区的蕃学教育以泉州、广州为主。这两个地区是对外贸易的中心,聚集了大量来华蕃客,尤以阿拉伯人为多,蕃学也多为来华阿拉伯人所设。据日本史家桑原鹭藏《蒲寿庚考》卷二六载:泉州“当宋真宗(998~1022)时,已为蕃客(指外国侨民)密居地矣”。当时,在泉州有“数以万计”的阿拉伯、波斯(今伊朗)穆斯林商贾和宗教人士,不仅“蕃汉杂居”,而且设有专供穆斯林外侨聚居的“蕃坊”^{[12]47}。神宗熙宁年间,程师孟知广州,“大修学校,日引诸生讲解。负笈而来者相踵,诸蕃子弟皆愿入学”^{[13]32}。来自大食的怀化将军辛押陀罗,“蕃酋也,闻风而起,亦捐资以完斋宇,且售田以赠之。后置别舍,以来蕃、俗子弟之愿学者”^{[14]4661}。“大观、政和(1107~1118)之间,天下大治,四夷响风,广州、泉州请建蕃学”^{[15]27}。大观二年(1108)三月“三十日,前摄贺州州学教授曾鼎旦言:‘切见广州蕃学渐已就绪……诏曾鼎旦充广州蕃学教授。’”^{[16]2768}这是广州蕃学教育建置完备的明确记载。

宋代西南地区的蕃学教育,主要分布在荆湖南、黔南等邻近少数民族、新设郡县之地。该地域为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聚居之地,随着中央王朝对这些地区统治的加强,势必通过教化手段以加强族群文化的认同。如“徽宗大观二年(1108)二月一日,黔南兴学御笔:‘黔南新造之邦,人始从化,虽未知学,然邈其鄙心,非学无以善之。委转运判官李仲将将以渐兴学,举其孝悌忠和,使之劝问’”^{[3]411}。即为在黔南兴学校,倡教化。孝宗淳熙八年(1181),“辅臣进呈湖南安抚转运司申郴州宜章县、桂阳军临武县(今湖南临武县),虽与溪峒接境,实国家省民,欲重恢乡校,招诱溪峒子弟入学训导”^{[3]412}。史料记载中虽未明确点明蕃学,但其地为“新造之邦”,教育对象是“溪峒子弟”,故也是具有蕃学教育性质的。

三、宋代蕃学教育师资与教学内容

如上文所论,宋代蕃学之设多位于西北、西南、广南、福建等偏远之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相对于中

原腹地,这些地区经济文化条件落后。为保障蕃学教育师资和蕃学教育质量,宋廷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以积极推进这些地区的蕃学教育。

首先,在办学资金和科举录取上给予重点扶持。熙宁八年(1075)三月戊戌,知河州鲜于师中乞置蕃学教蕃酋子弟,赐地十顷,岁给钱千缗,增解进士为五人额。从之^{[5]卷261}。不仅赐田地、划拨资金,为吸引少数民族子弟学习儒学,在科举录取中,还为蕃学生留出一定名额。其次,对从事蕃学教育的教师给予优遇。“大观元年(1107)十一月九日,郑宗奏:乞以地里远近,生徒众寡,量其难易劳佚,旌别教官”。边远地区的学生多少、师资状况受到官员关注。上奏后,中央批示:“水土恶弱州军,承务郎以上与转一官;三千里外承务郎以上可减一件磨勘;选人占射一次。其广南东、西不及四千里者,依四千里法。”^{[16]2767}显示出朝廷对边远地区蕃学教育的重视。再次,给予从事蕃学教育成绩突出者以特别的晋升嘉奖,增强示范效应。据记载,歙州进士黄庭贍任西宁州蕃学教授期间,在其教化之下,“蕃族子弟甚有能书汉字,通诵《孝经》渐习《论语》,皆知向方慕义,化革犷俗”者,蕃学教育成效显著。黄庭贍获得“特与将仕郎”,“以为训诱不倦之功”的嘉奖^{[11]340}。

除在资金、师资保障上采取一系列措施外,因蕃学教育的实施区域和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势必得照顾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故宋代蕃学教育在教育内容上表现出充分尊重边疆民族的文化传统的特点。《宋会要辑稿》载:崇宁四年(1105)八月二十八日,“诏陕西新造之郡,犹用蕃字,可置蕃学。选通蕃语识文字人为之教授,训以经典,译以文字。或因其所尚,令诵佛书,渐变其俗”^{[16]2766}。在教学内容上把传统儒家经典翻译成蕃字,采用蕃字、蕃语教学,甚至根据具体族群情况,“令诵佛书”。上引进士黄庭贍在西宁州蕃学担任教授,主要教授《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收到了“皆知向方慕义,化革犷俗”的效果。此外,泉州、广州的蕃学教育,由于教育对象多为来华的阿拉伯人,故蕃学教育的内容就富有伊斯兰文化特色。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认为,蕃学是“授蕃人以汉学之校”,主要是传授中国的传统经典,同时穆斯林子弟也可以学习有关伊斯兰教的其他知识^{[12]119}。也有一些蕃学采用阿拉伯语、波斯语教学^{[17]50}。

通过教化移风易俗,促进族群文化认同,是潜移默化的过程。所以宋代蕃学教育不仅在教育内容上注意到因地制宜,在教育原则上强调循序渐进,“渐变其俗”。广州的蕃学教育即体现出这一原则。大观二年(1108)曾鼎旦奏请“乞朝廷择南州之纯秀练习土俗者,付以训导之职,磨以岁月之久,将见诸蕃之遣子弟仰承乐育者,相望于五服之南矣”^{[16]2768}。强调蕃学教师须“练习土俗”之人,教育原则上不可急功近利,而须“磨以岁月之久”,潜移默化,以收取教化之功。

四、宋代蕃学教育的意义

宋代在边疆地区针对少数民族的蕃学教育,其教育目的无疑是为了推进“同风俗,一道德”,加强宋朝疆域内部的文化认同。有论著认为“宋比唐的世界主义为少,对外部世界经常采取防范和猜疑的态度”^{[8]126}。对此李华瑞指出,对宋人而言外部世界所指有二:其一宋人的疆域之外,其二宋人的经济文化之外^{[9]2}。其实,在宋内部世界(宋疆域之内)无疑存在一个外部世界(宋人经济文化形态之外的经济文化形态)。那么面对这一“内部世界里的外部世界”宋人绝非被动地“采取防范和猜疑的态度”。恰相反,宋人采取的是积极主动地改造和教化的进取态度。积极推进蕃学教育,意图达到使“蕃族子弟能通书文,诵习儒典,向方慕义,俗由化革”^{[11]340}的教化目的,即为这一立场的显著体现。

宋代蕃学教育的发展是与宋代推进“一道德,同风俗”同步的。王安石即言:“羌夷之性,虽不可猝化,若劝抚得术,其用之者,犹可胜中国人。”^{[5]卷247}但宋代蕃学教育毕竟推广于边疆地区,在国家财政吃紧的情况下,往往会压缩蕃学教育。熙宁八年(1075)十一月己未,“诏熙河路兵食吏俸日告阙乏,而蕃学之设冗费为甚,无补边计,可令罢之。其教授令赴阙,蕃部子弟放逐便”^{[5]卷270}。此言蕃学教育“无补边计”无非是因为蕃学教育作为一种文化浸润,只能潜移默化,而不可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罢了。

徽宗时期,为配合大规模开疆拓土,又在西北边疆广设蕃学。《东都事略》卷十、《宋九朝编年备要》卷二七、《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六均载,“(崇宁四年八月)诏陕西置蕃学”、“(崇宁四年八月)壬辰诏熙河兰湟路置蕃学”。可见蕃学教育之作用是受到宋廷认可与重视的。承担广州蕃学教育的曾鼎旦曾上言蕃学教

育的目的是使“仰承乐育者相望于五服之南”。南宋淳熙八年,针对湖南安抚转运司申奏“欲重恢乡校,招诱溪峒子弟入学训导”,孝宗指示:“开设学校,使强暴子弟知有礼义,庶几移风易俗。”^{[314]2}

总之,宋代的蕃学教育,虽然主观目的是为了加强统治的需要,但在客观上促进了将汉文化传播到西北藏区、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等边疆地区,有利于促进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有利于加强族群文化认同。

参考文献:

- [1]任树民.北宋官办蕃学初探[J].民族研究,1993(4):65-69.
- [2]本书编委会.岭南文化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
- [3]章如愚.群书考索[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
- [4]袁行霈,陈进玉.中国地域文化通览(陕西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5]李 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6]郭声波.宋朝官方文化机构研究[M].成都:天地出版社,2000.
- [7]孟宪承.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 [8]脱 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9]吴广成.西夏书事校正[M].龚世俊,校正.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 [10]李 埴.皇宋十朝纲要校正[M].燕永成,校正.北京:中华书局,2013.
- [11]慕容彦逢.摘文堂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
- [12]桑原骘藏.蒲寿庚考[M].陈裕菁,译.北京:中华书局,1954.
- [13]龚明之.中吴纪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4]阮 元.广东通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15]蔡 绌.铁围山丛谈[M]//唐宋笔记史料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6]徐 松.宋会要辑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17]马建钊.伊斯兰文化对广州回族社区形成发展的作用[J].回族研究,1994(2):48-55.
- [18]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世界历史地图集[M].上海:三联书店,1982.
- [19]李华瑞.宋夏关系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Discussion on the Education of Fan-xue in the Song Dynasties

Sun Tingl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China)

Abstract:“Fan-xue”, this word has three meanings. The Fan-xue Education in the Song Dynasties is the official school education that specifically in the border area, foreign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 area for these groups dedicated. In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the Fan-xue Education in the Song Dynasties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northwest of Qinghai, Gansu, southeast of Quanzhou, Guangzhou, and southwest of Hunan, Guizhou. The Song Dynasties developed a number of specific operational measures, providing guarantee for the Fan-xue education. In the teaching content, pay attention to take care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the border and minority areas. In the principle of education, emphasizing the influence character by environment, step by step, to avoid the quick success. The Fan-xue Education in the Song Dynasties mainly in Shen-zong, Hui-zong actively open boundary extension soil period, is the military means to explore and expand,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strengthen the identity of ethnic group through education.

Key words: Song Dynasties; Fan-xue Education; border area;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discipline

(责任编辑 张春生)